

启蒙时代的理性与信仰

(赵林主编)

Reason and Revelation: An Evaluation of English Deism

王爱菊 ◎ 著

理性与启示：
英国自然神论研究



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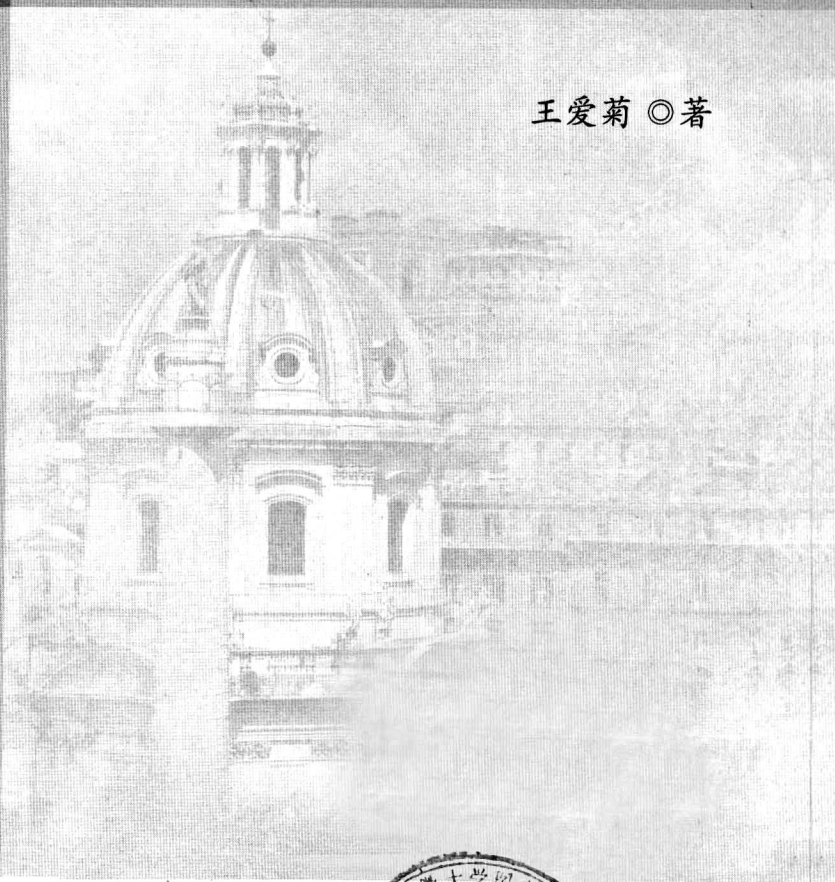
本书为湖北省2011年社科基金项目（2011LZ022）和
武汉大学2008年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的最终成果

启蒙时代的理性与信仰
(赵林主编)

Reason and Revelation: An Evaluation of English Deism

王爱菊 ◎ 著

理性与启示：
英国自然神论研究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性与启示:英国自然神论研究/王爱菊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
ISBN 978-7-01-011454-5

I. ①理… II. ①王… III. ①自然神论-研究-英国 IV. ①B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8326 号

理性与启示

LIXING YU QISHI

——英国自然神论研究

王爱菊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

字数:200 千字 印数:0,001-2,500 册

ISBN 978-7-01-011454-5 定价:37.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总 序

西方文化的现代转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化时期,15、16 世纪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文艺复兴和北部欧洲普遍发生的宗教改革无疑构成了西方文化转型的开端,与此相应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化如海外航线的开辟、商品经济的兴起等,也极大地推进了西方社会的变革。但是从西方现代化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自 17 世纪发轫的启蒙运动才是中世纪与现代之间的真正分水岭。文艺复兴运动虽然大声疾呼人性的解放,但是这场主要局限于文学艺术领域的变革活动仅仅停留在感性的层面上,并未将人性解放提升到理性的高度,而且人文主义者们对于罗马教廷的权威地位也丝毫不敢触动。宗教改革运动虽然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专制格局,在客观上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崛起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但是这场旨在弘扬信仰的改革运动仍然带有浓郁的中世纪气息,它的主观动机并非要开创一个新世界,而是要回归一个旧时代。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所发生的 15、16 世纪相比,17 世纪无疑是一个具有崭新时代精神的时代。如果说 15 世纪是一个文学艺术复兴的时代,16 世纪是一个宗教信仰重振的时代,那么,17 世纪就是一个哲学和科学兴盛的时代。与 15 世纪的感觉主义、16 世纪的信仰主义相比,17 世纪最突出的时代特征就是理性精神。

怀特海曾把 17 世纪称为“天才世纪”,在那个时代,一大批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思想形态的伟大哲学家和科学家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其中最著名的有弗兰西斯·培根、笛卡尔、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莱

布尼茨、伽利略、开普勒、惠更斯、波义耳、雷汶虎克、牛顿等(他们中间有些人虽然出生在16世纪,但是其主要的哲学著述和科学发现活动都是发生在17世纪)。这些如雷贯耳的人物不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创建了丰硕的学术成就,用一套全新的概念系统和思想体系突破了中世纪陈旧烦琐的旧藩篱,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运用理性精神在西方知识分子心中树立起两个相互补充的新观念,这就是自然秩序的观念和人类天赋的观念。前者展现了一个严格遵循普遍必然性法则而运行的自然世界,这个自然世界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甚至连它的创造者——上帝——也不能任意干预和破坏它的固有法则(从这个严格遵循既定法则的自然界中也就顺理成章地推演出一个按照契约精神而运行的宪政社会);后者则将理性确立为人的精神本质,从天赋观念、天赋禀性中引申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从而将自由、平等、私有财产等权利树立为不可侵犯的神圣人权。正是在这两个新观念的引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才得以在西欧各国普遍开展,一个符合理性精神的西方现代社会也因此而顺利地生长起来。

西欧启蒙运动本身也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它的思想酝酿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的自然神论,而后被18世纪法国的激进知识分子们推向了反叛的高潮,再后则在18—19世纪德国人的深刻而晦涩的哲学批判和宗教批判中实现了传统与更新、信仰与理性之间的辩证协调。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启蒙运动似乎仅仅是一场法国人的激进思想运动,乃至于一谈起欧洲的启蒙,人们就会想起伏尔泰、狄德罗等法国知识分子高举理性大旗对传统宗教信仰和专制体制的猛烈抨击。事实上,法国启蒙运动只是整个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过于偏激的组成部分。启蒙不仅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法国思想运动(近代的法国人一向喜欢标新立异、剑走偏锋,喜欢制造形形色色的文化“运动”),同样也是英国人、德国人和欧洲其他国家知识分子的一次深刻的思想反省和文化更新。因此,全面地考察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演进历程,深入了解

除激进的法国人之外的其他各国知识分子的启蒙观念,动态地把握理性精神在欧洲启蒙历程中与传统的宗教信仰之间的辩证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它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深入认识,而且也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提供有益启示。

“启蒙时代的理性与信仰”丛书通过研究 17—19 世纪西欧一些重要思想家关于理性与信仰之关系的不同观点,以说明在宗教改革以后的数百年间,新兴的理性精神是如何挣脱传统信仰的束缚而迅猛崛起,并且通过对基督教信仰的深刻批判,最终与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的基督教信仰形成一种互补的协调关系,从而共同为西方现代文化奠定精神根基的。

本丛书主要由一系列相关的博士论文组成,这些博士论文或侧重于考察 17 世纪英国自然神论者是如何在信仰的旗帜下大力弘扬理性精神,或着眼于研究 18—19 世纪德国启蒙思想家是如何在理性与信仰之间形成一种和谐互补。本丛书的出版将有利于纠正国内学术界过分偏重于法国启蒙运动而忽略欧洲其他国家启蒙思想的片面性,从而使国人更加全面和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的现代转型历程。

赵 林

2012 年 10 月 12 日

目 录

总、序	赵 林 1
导 论	1
第一章 理性与信仰:在英国自然神论之前	35
第一节 中世纪	35
第二节 大陆宗教改革	47
第二章 合理性的信仰:英国的理性时代	54
第一节 理性:从天赋观念到经验理性	55
第二节 信仰:“合理性”的同意	66
第三节 洛克论理性和信仰	92
第三章 赫伯特的理性观和启示观	104
第一节 赫伯特的认识论和真理观	107
第二节 赫伯特的理性观	116
第三节 赫伯特论信仰和启示	121
第四章 托兰德:启示理性化	132
第一节 思想渊源	133

2 理性与启示——英国自然神论研究

第二节 托兰德的理性观	136
第三节 托兰德论启示和信仰	146
 第五章 廷得尔:理性启示化	159
第一节 从托兰德到廷得尔	159
第二节 理性启示化	163
第三节 信仰道德化	183
 结 论	189
 参考文献	201
后 记	214

导 论

一、理性、信仰和启示

理性和信仰的关系是基督教哲学的基本问题。按照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信上帝以及上帝的启示。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世界,赋予了它和谐与秩序,所以人类和世界的存在、价值以及终极意义最终取决于上帝。可是,人毕竟只是有限的受造物,在认识和思考时也是有限而不完善的。因此,人若要达到对无限和完善的上帝的真正认识,不能只是通过人认识其他受造物的方式,还需要借助于上帝向人类的自我显现或者启示。上帝的启示起始于天地的被创造,以后便随着始祖亚当和夏娃、摩西、先知逐渐发展,直至道成肉身于耶稣之中达到最高点。记录着这一切的《圣经》就是上帝之言,是上帝赐予世人关于他自己的永恒有效的启示。历史上的基督教思想家无不以传播、解释和维护启示为己任。在此过程中,理性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如何理解与诠释信仰、如何判断作为信仰对象的启示的真伪、如何论证和维护启示和对启示的信仰,必须借助于人的逻辑推理和理性反思才能完成。虽然有些基督教思想家坚持信仰主义,完全否认理性在信仰中的作用,可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得出这种结论,也正是运用理智的结果。所以,在西方基督教历史上,理性和信仰如同是一对“争斗的兄弟”(fighting brothers),互相对立,纠葛不断,却又彼此补充,互相促进。二者若即若离,又不离不弃,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共同构建了基督教哲学,形成了西方基督教哲学中重复出现且不断

变化的核心主题。

这个主题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邓晓芒曾经用西方哲学中的“逻各斯”和“努斯”精神来解释基督教中理性真理和启示真理之间纠缠不休的关系。他认为,基督教真理的哲学根基是“一”的思想,即同一性、普遍性和共相,而这来源于希腊哲学中作为语言本质的“逻各斯”。赫拉克里特提出“神圣的逻各斯”,认为逻各斯的神圣性只在于它是唯一的“一”。后来,埃利亚派把逻各斯的“一”和存在的“一”以及神的“一”融合起来。巴门尼德认为,有一个“绝对同一的存在”,而且这个存在是最高和最终的实体,自己没有起源却是其他万物的起源。到了柏拉图那里,“一”成为不受变动不居的杂多事物影响的自身同一性作为真理的根本特征,从而被看做是真正的神性。以普罗提洛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则把最高的“太一”明确归于上帝。可以说,逻各斯是基督教之中理性真理的普遍性和合理性的哲学基础。不过,基督教的理性真理和启示真理之间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以希腊哲学的“努斯”精神为纽带的。“努斯”的含义是灵魂和心灵,是与整个物质世界划分开来的纯粹精神,体现了能与超越的纯粹精神和纯理性,是个体灵魂超出自身的有限而向无限和完满不断攀升的能力,所以可以被认为是基督教之中启示真理和道德原则的哲学基础。二者都是理性,逻各斯代表着规范和法则的理性,努斯代表着个体灵魂超越感性并统摄此岸感性世界能力的理性,而逻各斯是努斯本身的一种表达,也是其实现的途径。“启示来自于努斯、灵魂对彼岸声音的关注、追求和倾听,亦即来自于信仰,理性、逻各斯则在一切人那里确证这种启示,正如苏格拉底从别人口中自由说出的话中确证自己心中的真理一样。”^①从深层次上看,理性和启示之间互相冲突、互相补充而且割舍不开的关系来源于努斯不断

^① 邓晓芒:《真理:在神学和哲学之间》,见《中西文化视域中真善美的哲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9页。

超越感性并寻求在逻各斯之中得到表达和印证的力量。

这种从基督教哲学根基上去把握理性和启示关系的理解无疑是非常精辟深邃的。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简单地说,基督教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内在张力也决定了理性和信仰、理性与启示之间的张力。基督教认为,人生活在此岸世界,却不属于此岸世界,应该不断超越此岸世界,并努力趋向彼岸世界。这种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不可避免地导致基督教本身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内在张力。

从本体论上看,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是一切真理的来源,故而真理必然被上帝自上而下启示出来。否则,有限的人就无法获得关于无限的上帝的真理。因此,要认识上帝那不可预测也不可验证的真理,必定要先有上帝赐予的信仰,也就是说,启示以及对启示的信仰必定先于理性。可是,从认识论上看,为了认识上帝的真理,人类必然是从自己出发,以个体的体验和思考为起点,自下而上地去认识上帝以及上帝的启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人才能决定上帝的存在,理解上帝的属性,了解《圣经》的内容,判断启示是否确为神圣,体验人与上帝的沟通。所以,人要获得对上帝的认识,必定先要有理性。也就是说,理性必定先于启示。在这种意义上讲,理性和信仰必然产生内在的矛盾和冲突。

不过,正如努斯不断地寻求与逻各斯达到统一,理性和信仰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一方面,信仰永远不会仅仅简单地停留为内心的单纯信仰,总是要不断寻求理解,以便获得在个人言语上的表达以及与他人的认同。另一方面,按照基督教教义,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将理性赋予人,所以理性成为人和上帝之间的相似性,具有某种神性。正如《旧约·创世记》第2章第7节所言,“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由此,凭借理性,人完全能够达到对上帝以及上帝的启示的某种认识。当然,不同的历史时代对于理性如何认识上帝有不同的见解,这也导致了理性和信仰之间关系的

永恒变化,对此本书将具体阐释。

除了基督教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内在张力,基督教的历史渊源也导致了理性和信仰之间既矛盾又协调的关系。众所周知,基督教脱胎于母体犹太教,后来随着欧洲的基督教化,逐渐吸收了希腊—罗马文化圈的哲学思想。“具体地说,希腊的唯心主义哲学为基督教提供了一套形而上的神学思想,而希伯来的犹太教则为基督教准备了一个历史背景(圣教历史)和精神氛围(罪孽意识和救世福音)。”^①在早期基督教向希腊化地区传播的时候,一大批基督教护教者为了驳斥异教徒哲学家的批判,更是为了辩护和宣扬基督教教义,开始运用哲学的方法和哲学家的语言来解释基督教的信念和基督徒的行为。他们用希腊哲学中深刻的形而上学思想来阐释基督教的救世福音和基本教义,竭力使基督教教义与希腊哲学融合起来。《新约》四大福音书中的《约翰福音》便是基督教和希腊哲学碰撞与融合的最初产物。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这三本“同观福音”相比,《约翰福音》在结构、观点和取材上与它们有很大的不同。以四部福音书的开头来说,三本同观福音或者追溯耶稣的家族谱系到亚伯拉罕,或者讲述施洗约翰的预言和故事,无不是强调耶稣和犹太教之间的连续性。可是,《约翰福音》中那句非常著名的开头却说:“太初有道(Logos),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分明是把上帝和基督与希腊哲学中的道(逻各斯)的概念等同起来。

通过对希腊哲学的改造和融合,在经历了长时期的艰苦辩难之后,早期的护教者和教父逐渐建立了原罪和救赎论、神圣三一论、基督二性论等基本教义。在此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基督教教义的独特性和普遍性的问题。基督教以耶稣基督这个人物为中心,以他降临、受难并复活的一生故事为顶点,必然宣称耶稣基督的训导具有独特的意义,而且只有基督才是真理,才是世人得救之途。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基督的训导或者启示

① 赵林:《西方文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与希腊哲学家通过自然理性所发现的关于神的知识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如果两者完全不同,那么就会显出基督的训导缺乏普遍性,也会显出上帝的随心所欲和非连贯性。如果要使上帝的道显得更加合理一些,那么就应该让基督的训导类似于古代那些源远流长的真理。可是如此一来,基督的训导就有可能变成对古代哲学平淡无奇的重复,从而缺乏独特性,也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基督教哲学必定要在保持“努斯”所代表的启示真理的独特性的同时,努力去追求“逻各斯”所代表的普遍真理的普遍性和同一性,而这种努力必然会导致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启示真理和具有永恒普遍性的理性真理之间互相对立而又不可偏废的平衡关系。

实际上,无论是基督教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内在张力,还是基督教在启示真理的独特性和理性真理的普遍性上的平衡策略,都只是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出了“逻各斯”和“努斯”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是由于“逻各斯”和“努斯”之间存在对立统一这个最为根本的原因,理性和信仰必然时而互相依赖,时而互相攻击,并且在互相纠葛的过程中,使基督教哲学获得持续的发展和丰富。在进一步讨论基督教思想家们具体的理性观和信仰观之前,有必要先来界定一些相关术语,例如信仰、理性、启示、自然神学和自然宗教。

基督教首先是一种信仰。从一般意义上讲,信仰(faith)包含两个基本的方面:其一,作为主观行为的信仰(faith),即个人的信任或者相信;其二,作为客观对象的信仰(the faith),即作为被相信对象的客观事物或命题。日常意义上的信仰必然涉及某个可以信赖的对象,如某个人所说的话或一本书的存在。宗教意义上的信仰,通常则会涉及被相信的某个宗教命题或者教义,如宇宙是上帝创造的,等等。基督教作为一套丰富的信仰体系,包括本体论,如什么是上帝,上帝与人的关系如何,什么是人等;认识论,即上帝如何揭示自我,并如何让人了解他的属性和意志;还包括关于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如耶稣的生平故事;最后还包括伦理学,如摩

西的十诫和耶稣的训导等。^①

作为个人主观相信的信仰,则可以被区分为认识论意义上的相信或同意(belief, assent)和拯救意义上的信靠(trust)。认识论意义上的信仰,通常指人类对基督教教义或者命题的认识和相信,其对象是人所获得的关于上帝的知识。拯救意义上的信仰,通常指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任和委身。前者要求人有足够的证据才能去相信,后者却是在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去相信某事物的真实性。对于这两个方面的关系,马丁·路德曾经用坐船过海的比喻进行说明。认识论意义上的信仰是很确切地相信一条船的存在,而拯救意义上的信仰不仅是相信船的存在,更是信任这条船可以安全地载人过海。如果船是否存在可以得到证实或证伪,那么该船能否安全地载人过海则在过海之前难以确定。如果人只是相信船的存在,而不肯信任它可以安全地载他过海,那么他会不愿意上船,从而永远过不了海。所以,拯救意义上的信仰,不仅是相信上帝是真实的存在,更是去信靠上帝的应许,信任耶稣有能力把人从罪恶之中救赎出来,从而将自己委身相托,与耶稣联合为一。^② 基督教主流传统往往同时看重信仰的认识论意义和拯救意义这两个方面,而不会偏废其一。像德尔图良所说的“惟其不可能,我才去相信”的极端信仰主义的主张,在西方基督教历史上,总归只是少数。其实,无论德尔图良如何否认理性在信仰中的地位,他都无法否认,他正是运用了理性,才能够得出这样反理性的结论。

信仰总是要寻求理解,寻求证据支持。基督教信仰的证据通常来自于两个方面:理性和启示。理性之所以对于信仰十分必要,在于人需要理性去理解《圣经》和自己所相信的教条,以及有条理地说明和论证信仰的客观内容。从通俗意义上讲,理性就是人心运用逻辑的方法讲明道理和探索真理的自然能力。首先,理性最为简单和狭窄的意义便是形式逻辑,

^① See Helm, Paul. *Faith and Reason*,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7.

^② 参见许志伟:《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即通过归纳和演绎的方法从前提得出结论的抽象推论。譬如三段论: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这种推理是纯粹形式上的,如果前提正确,并且在推理上符合逻辑规则,那么结论便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对理性的理解与信仰是没有矛盾的,因为这种意义上的理性并不提供信仰的内容,纯粹只是为神学服务的工具。经院哲学便是这种逻辑推理的典型代表。其次,关于理性的另一种理解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与作为认识对象的真理相关,具有一定的实质性内容,如古希腊哲学关于神的理解便是这种理性的代表。人运用独立无依的理性可以发现信仰的内容,至少是部分的内容,如世界具有第一因,是由某个设计者所创造出来的。对于这些纯粹依靠理性所发现的真理,启示可以是必要的补充,也可以是这些真理的再次发布,但是却不能取消和抹杀它们。其典型例子便是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神学关于理性的理解。有时候,基督教否认这种理性认识的能力,认为原罪彻底败坏了人的这种能力,所以需要上帝的恩典加以修复才能重新发挥作用,如加尔文主义。

如果自然神学是对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的肯定和推崇,那么怀疑论便是对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的否认和排斥。怀疑论者认为,我们无法认识客观世界,也一无所知,故而通过理性所认识的真理是不真实的。不过,这种对理性的怀疑并不必然导致人去怀疑信仰的对象,反而很奇怪地成为信仰的前提和基础。基督教传统中本来就存在着对人类依靠理性所获得的世俗知识的怀疑和不信任。这是因为,基督教信仰作为一种对彼岸世界的信仰,本身就意味着对世俗智慧的怀疑和否定,而这种怀疑恰好成为了真正信仰的前提。^① 在《圣经》中,我们不难看出对此岸世界的知识和智慧的彻底颠覆。在《旧约·传道书》(1:14)中,传道人以怀疑的口气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新约》中,耶稣在讲道中体现出的逻辑和智慧也与世俗智慧和犹太教传统恰恰相

① 参见邓晓芒:《论中西怀疑论的差异》,《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反,他还常常用悖论的方式来宣讲基督教教义。当门徒们在讨论谁将为大时,耶稣却领了一个小孩子过来,说“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路加福音》9:46—48)。对人的理性的怀疑甚至还可以成为为信仰辩护的武器。例如,在17世纪,怀疑论便是罗马天主教护教者的“新的战争机器”,用以否认新教教徒能够依靠自我的判断来诠释《圣经》。他们反问新教徒,如果新教徒反对将教会对《圣经》的解释奉为权威,那么他们又如何能够确切地知道哪部圣经文本才是正典?他们每一个人又如何能够确切地知道自己掌握了《圣经》每句经文和每个单词的意义?然后,他们进一步证明只有教会的解释才具有唯一的确定性,而要避免新教在理解《圣经》上的分歧,只有委身天主教会,才能获得绝对无误的理解。不过,新教徒很快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认为即便委身天主教会,也不能保证一定能够确定地理解天主教的每一位教父、每一次公会议和每一任教皇的训导。^①

上述两种关于理性的理解都是认知意义上的理性,关涉如何理解宇宙及其神圣的来源(本体论),以及如何评价关于宇宙和上帝的不同理解(认识论)。除此之外,理性还有道德实践上的含义,如康德对于理性的理解。“理性”这个概念在康德那里具有不同的含义。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理性包括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部分;在最狭隘的意义上,理性则是指与感性和知性不同的作为第三阶段的认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认为,理性是一种先验的能力,单凭自身就能产生某些概念和原理,无须借助知性和感性。理性区分于知性,以知性为认识对象,并不与感性直观和经验对象发生关系,所涉及的是理论理性。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理性所涉及的是实践理性或道德的领域。理性运用于理论方面时给自然界立法,运用于实践方面时就给人颁布道德律。康德认为,理论理性不能获

^① See Burns, R. M. *The Great Debate on Miracles: from Joseph Glanvill to David Hume*. London: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9.

得关于上帝的真理,所以应该把信仰从认识论的领域驱赶出去;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以实践理性(道德)为基础证明了上帝存在的必要性。

和理性一样,启示的含义也很复杂。启示(revelation)在拉丁文中是 *revelatio*,在希腊文中是 *apocalypsis*,本来是指隐藏的事物通过不同寻常的心理活动得以揭示出来。按照这种广义的理解,很多宗教都有启示,例如佛教中的“觉悟”就是指众生在经过修行和佛经开导之后去除障蔽,觉见光明。在基督教信仰中,启示具有特定的含义,是指上帝在宇宙和人类历史中,为了拯救人类而向人类揭示自我的本性、目的和意愿的所有活动,是上帝给予人类的关于他自己和关于人类得救的直接的知识。对于基督徒而言,信仰就是相信上帝的启示,没有了启示,信仰便没有了基础和目标。没有了信仰,整个基督教的大厦便摇摇欲坠。耶稣将启示委托给教会,教会以捍卫启示为己任,在神圣启示的号召下得以存在。启示的存在和可了解性是神学存在的前提。神学其实就是对启示信仰的系统性思考。安瑟伦说:“理解他所相信的”,而托马斯·阿奎那指出,“神圣教义”就是“按照神圣启示的关于上帝的启示”。卡尔·拉纳对神学的定义是:“神学是关于信仰的科学。它是有意识、有方法地去解释阐明信仰所接受、所把握的神圣启示。”神学家们的任务就是以神圣启示为观照,来考察当时的教义和宗教实践,揭露和启示相违背的解释,并澄清启示的内容和意义,还要以启示为基础来证明基督教团体的信仰。^①

在近代以前,西方的基督教传统视启示为理所应当的事情,毫不怀疑启示的真实性和必要性。有限的人要想认识无限的上帝的本性和意志,通过有限的理性似乎难以成功,所以上帝的自我启示必不可少。在早期基督教时期,尚未出现与启示对立的概念,如凭借自然理性所获得的知识,所以早期基督教的护教者并不感到因为要驳斥与启示的对立观念而

^① 详见 Avery Dulles, *S. J. Models of Revelation*. Dublin: Gill and Macmillan, 1983, p. 5.